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

——基于扎根理论的云南和顺图书馆的案例研究

耿 达

摘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培育和发展是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但已有研究对其生成机制和发展路径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本文基于文化参与的视角，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以云南和顺图书馆为案例进行分析，构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在自发生成阶段，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依赖于乡土社会的内部资源网络及其调适能力，主要是立足乡土服务乡邦。（2）在政府主导阶段，政府逐步加强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管控，并按照事业单位体制建立起科层式公共文化生产分配体系，资源向上集中。这虽然从体制上保障了其有较稳定的经费来源，但同时导致其“悬浮”于乡土社会，与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脱节。（3）在共建共享阶段，以农村居民文化需求为导向，政府不断优化体系建设，鼓励社会参与，重视各方力量的汇入与整合，建立各方联动的协同机制，提升了综合效益。本文指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基于乡土社会、政府行为、社会资源、功能转型、民众参与等要素。本文所建构的理论框架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提供了参照，并对相关政策实践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公共文化空间 生成机制 乡土社会 政府行为 共建共享

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居民人际交往、信息交流、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对于促进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信仰和特色文化等有重要影响，并且还发挥着交往沟通、休闲娱乐、宣传教化、心灵慰藉和柔性治理等作用。因此，培育和发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

*本文研究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项目“云南民间文化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YNZK201826）、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规划2019年度招标项目“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9sy020）和云南大学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的资助。感谢外审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相关研究和报道指出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固有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面临“功能弱化”“公共性消解”“悬浮化”“虚无化”“同构化”“空心化”“格式化”等诸多问题(陈波、耿达,2014)。这些研究报道显示,从传统改造与现代转型的路径来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并不完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什么会发展不畅?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在此基础上,来探究具体的发展路径。这些问题既有研究较少涉及且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选取具有90年发展历程的云南和顺乡村图书馆为案例进行分析,尝试从文化参与视角解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并探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主体(政府、社会力量、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状况和效果。

二、文献综述

用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来指称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与公共文化活动和依附于其上的一套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治理体系,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研究趋向。但是,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农村社会现代转型的一种实践形式并非新现象,它既包括政府主导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如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送文化下乡”等各种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开展,又包括农村自发的民间文化生活空间,如祠堂、农家文化大院、民间艺人和民间文化组织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本文关注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有两类研究的解释与之密切相关:一是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二是文化场景视角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

(一)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从文化治理的视角出发,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一种认识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要以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为导向,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和共享的文化运行模式(耿达、傅才武,2015),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能,增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一方面,要健全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吴理财(2015)认为在现代文化治理理念下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参与主体。唐亚林、刘伟(2018)指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是党建引领,要完善党建精神注入机制、组织嵌入机制、阵地拓展机制、平台协商机制、政策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重构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何兰萍(2007)指出公共文化空间日益退缩导致农民精神生活虚空和伦理价值迷失,因此需要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马永强(2011)认为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需要充分提升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影响力、整合利用现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资源并拓展其功能、大力发展各种农民自助合作组织、建构文化传播机制并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与乡村政治文化传播空间的建构。李志农、乔文红(2011)指出,实现内源性与外源性公共文化空间^①交融互构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方式。另外,近年来江浙农村兴起了融合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章丽华(2014)指出农村文化礼堂是以传承和创新为原则、以整合资源为手段、以转型升级为方向来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

^①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指具有乡土社会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的场所与活动,如祠堂、民俗节庆等;外源性公共文化空间指政府行政力量主导建设提供的设施与服务,如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与政府送文化下乡等。

在文化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偏重于政府行为策略的探讨。这些研究多数采用“诊断式”分析方法，依据“问题—原因—对策”的逻辑来分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并提出重构路径。这类研究针对性强，但缺乏对过程的探索，因此对策建议存在泛泛而谈的弊端，忽略了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深入论证。

（二）文化场景视角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场景理论是以美国学者克拉克(Clark)为代表的新芝加哥学派提出的一种城市社会学研究新范式。该理论认为场景是城市中生活娱乐设施的组合，蕴含在这些场景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形成抽象的符号和信息传递给不同的人群，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选择，进而影响城市的转型发展(Clark, 2013)。吴军、祈述裕等人将场景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会文化转型领域的研究，为城市创意阶层的兴起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傅才武、陈波等人进一步将场景理论运用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借鉴克拉克教授场景理论的三个主维度（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和十五个次维度的解释框架，设计出了一套当代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比如，傅才武、侯雪言(2016)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分为物理空间、活动空间和机制空间三个维度；陈波、丁程(2018)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分为内生性和外生性两种类型，根据设计的场景维度，代入调研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状况和特征。陈波、侯雪言(2017)还设计了居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影响因素模型，他们认为公共文化空间与居民文化参与率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进而提出在文化表达、文化氛围等方面完善公共文化空间、提高公共文化参与率的政策建议。

在文化场景视角下，学者们主要关注“场景”的指标体系及测度方式，但他们主要是套用场景理论分析框架，并没有根据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有针对性地进行仔细分析。相关研究还忽略了基层政府、社会力量、农村居民等多元主体互动过程的情境因素。这些都导致文化场景视角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还停留在较为粗浅的分析讨论上，只是给外来的场景理论作注脚，有待进一步深入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情境之中，探索总结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理论框架。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主要从文化治理视角和文化场景视角出发。前者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和治理模式给予了探讨，后者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给予了分析。然而这两种视角均存在不足之处：文化治理视角的研究聚焦政府行为策略的经验事实表述，忽视经验过程的生成机制分析；而文化场景视角的研究则强调场景维度的规范意义表达，存在技术处理难题，也缺乏对发展路径的阐述，两种视角都忽视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演进的具体过程。这为本文进一步探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实际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中国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文化参与的主体性建构理应得到重视。从文化参与的角度来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本质上是各个认识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主体性建构过程。鉴于此，本文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放在政策外部激励与乡土社会内部生发的视角下加以考察，重点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主体的文化参与状况及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视角

文化参与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它既属于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又是政府公共文化政策制定的方向。澳大利亚政府在《创意的国度》(Creative Nation)中指出，文化“发轫于社区”，文化奉“社区参与的权利”为圭臬(布赖恩·多利、尼尔·马歇尔，200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统计框架 2009》中将文化参与定义为“既包含那些可能涉及到消费的文化实践，又包括那些在社区中开展、能够反映生活质量、传统和信念的活动”(UNESCO, 2009)。在欧洲国家，地方政府通过让更多民众参与本地公共文化生活，来增强民众对荣誉、责任的深切体验，增强人际相互信任、互惠合作，完善民主机制，使社会各界在互动中建立共同体意识(任珺，2014)。文化参与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文化参与能够培育公共精神、重建社会秩序和重塑公共性(吴军，2015)。同时，文化参与是可测算的。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统计机构发布了《文化参与衡量报告》(Measuring Cultural Participation)。该报告认为“测量文化参与”的意义在于：“通过定量及定性的方式测量并理解所有个体参与的文化活动。对于个体而言，这是一种提升信息获取与资本积累能力的方式，有助于个体身份与意义的表达”(UNESCO, 2012)。该报告并未建立具体的文化参与测量框架，但对测量实践给予了方法上的指导。在王永章、胡惠林主编的《中国文化发展指数报告》中，将文化参与指数分为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活动参与、文化活动供给三个维度来进行测算(王永章、胡惠林，2016)。

文化参与有三个基本要素：参与的主体(即“谁参与”)、参与的客体(即“参与什么”)和参与的途径(即“怎么参与”)。参与的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力量及公民个人，参与的客体即是公共文化空间，参与的途径包括是由政府主导还是自主型发展式参与、参与人员的结构是单一还是不同社会阶层均参与其中、参与内容形式简单还是从内容到形式均呈现多样化、多层次态势等等。在乡村公共文化领域，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面临式微的困境。如吴理财、邓佳斌(2014)指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民主参与式微表现在文化决策认同危机、文化参与机制缺乏和村落文化参与式贫困。张小莉(2015)则进一步指出农村公共文化参与面临参与的主体趋于分化、参与的内容趋于私性化、参与的内涵趋于简单化等问题，提倡重拾文化参与的民主价值、建构科学系统的公共文化参与机制。

本文选择文化参与研究视角的原因主要基于三点：一是文化参与是驱动和塑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的源动力，通过文化参与能够培育乡村社会公共秩序，使社会各界在互动中建立共同体意识；二是文化参与可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式进行测量，不同的参与方式、参与程度能够体现不同参与主体的文化表达；三是文化参与能够体现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关联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能够展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立体化多面向的情境。从文化参与视角来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就是各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力量及公民个人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重视农村居民的文化主体性，增强农村居民的文化认同，提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服务效能，使社会各界在互动中建立一种乡村文化共同体意识。

（二）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1967年由社会学家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与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提出的一种经典的质性研究方法(Glaser and Strauss, 1967)。它的特点是坚持问题导向,直接从原始资料 and 实际观察中归纳概念,自下而上建立一套理论框架。这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从现有的概念或理论出发来进行逻辑论证的路线大相径庭(陈向明,2000)。扎根理论在资料搜集、数据分析、研究范式和探寻社会现象间关系、建构理论等方面有着显著优势,且“流程清晰、步骤明确,可操作性强,具有规范性与科学性”(贾哲敏,2015)。

本文选择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现有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其生成机制的研究几乎阙如。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发展有别于城市,且中外乡村差别较大,缺乏可借鉴的理论成果。为深入了解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这一社会现象,探寻相应规律,不作任何理论假设,在原始资料和经验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扎根理论方法便成为本文研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合理选择。二是定量研究无法深入解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过程,扎根理论却能够通过通过对繁琐、细致的社会现象进行历时性研究,发现动态过程、变化规律与互动关系,而停留在数据统计描述和相关性分析层面的定量研究难以对此进行阐释。扎根理论对解决过程类问题非常实用,经典的研究实践有格斯克(Gersick)使用扎根理论考察团队发展的生命周期(Gersick, 1988),博泽拉夫(Bezboruah)与卡拉比(Karabi)利用扎根理论研究社区中非营利机构进行健康服务的全过程(Bezboruah and Karabi, 2013)。

（三）案例选择及背景介绍

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理论抽样原则选择云南和顺图书馆(1928-2018)为案例,具体原因如下:(1)典型性原则。和顺图书馆位于中国西南边疆小镇腾冲,创建于1928年,是和顺旅缅华侨为振兴家乡文化教育而捐资创办的乡村图书馆,至今已有90年历史,被誉为“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在一定意义上讲,和顺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乃是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历史缩影,甚至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图景的集中呈现。就和顺图书馆自身发展而言,它经历了由私立图书馆到公共图书馆的转型,功能也不断扩展延伸;就和顺图书馆与社会变迁而言,和顺图书馆的产生发展是与地方乃至国家甚至南亚东南亚区域性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把和顺图书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考察,即走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部,通过和顺图书馆这一“窗口”来探视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的社会镜像,具有重要研究意义。(2)数据可获得性原则。首先,图书馆本身具有收集整理档案、处理地方信息的功能。和顺图书馆的档案保存较好,涉及和顺图书馆发展的方方面面,非常详尽。这些档案包含了大量的工作计划、总结报告、管理制度、组织条例、书籍清单及阅览数字统计,全面清晰地反映了和顺图书馆的基本状况,为了解和顺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以及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充实的一手资料支撑。其次,和顺图书馆为更好地服务读者,于2011年8月开通了网站。这为本文研究及时掌握和顺图书馆的最新动态,获取相关讯息提供了便利。最后,笔者对和顺图书馆的馆员、读者以及乡镇干部、农村居民和游客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文研究收集的数据资料相对完整,而且,来自多个渠道的数据资料可以相互印证,能够保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四、数据分析

扎根理论讲求对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要求对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阶段编码,重视资料之间的比较与关联。本文研究通过对资料的归纳、提炼与比较,最大程度确保每一项理论建构都来源于资料本身。编码的核心并不是将数据资料量化以便于统计与计算分析,而是进行有效的分类与概括,以便提炼概念、展示意义、明确关联并建构理论。由于本文研究的档案资料较多,且调研受访者描述内容较为集中化、主题化,故编码阶段采取的策略是依据事件进行历时性编码,借助定性研究软件 NVIVO10.0 进行资料编码分析,以筛选出最能体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概念,并进行理论抽样、饱和^①。

(一)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对原始资料(文本、图片、数据)进行聚敛和解读,从中归纳出概念。本文研究通过对和顺图书馆发展历程资料进行初始编码,从中提取出 98 个概念,并进一步将相似概念聚拢成范畴,建立起 17 个副范畴(参见表 1)。

表 1 和顺图书馆资料的开放性编码分析

编号	副范畴	概念
1	地理环境	西南边陲、依山傍水、与缅甸相邻、商贸集散地
2	文化环境	文化之津、马帮文化、八大宗祠、耕读传家、十大名镇、文化旅游
3	社会名流	胡适、李根源、张天放、寸树声、龚自知、廖承志、熊庆来、汪曾祺
4	华侨同胞	旅缅华侨、为家乡购置图书、引进科技文化、投资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促进家乡发展
5	乡贤群体	李祖华、李镜天、李舜初、寸杰生、段镜秋、李镜泉、刘惘含、李仁杰、艾思奇、李生庄
6	民间社团	咸新社、青年会、阅书报社、崇新会、星光音乐社、书友会、诗友会
7	村庄秩序	民间与学校共用共学、家家贴对联、户户有藏书、兴仁讲让、社群空间、乡土情怀、乡风文明
8	行政干预	文化部门、公共图书馆建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员编制
9	科层管理	文化事业单位、考核评估、向上级负责
10	文化需求	读书看报、获取信息资源、借书、上网、文艺培训
11	地方企业	腾越日报社、福盛隆、洪盛详、永茂和、茂恒、福春恒、腾冲新知图书城、保山新华书店
12	文化体验	生活园地、读书天堂、心理愉悦、乐民育民富民
13	文化认同	以捐书为荣、最美乡村图书馆、俗美风淳、文化图腾、普遍信任
14	社会教育	启智化愚、开启民智、辅助教育、增进地方文化、传播知识
15	资源输入	购书经费、建设资金、免费开放资金、专项奖补、政府购买
16	公共服务	图书借阅、图书展览、公共文化服务、专题讲座、信息共享
17	科技革新	无线电、收音机、电子阅览室、电子借阅机、数字化培训室、手机阅读、数字时代

(二) 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是发现和建立概念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上述开放性编码提炼出多个范畴的基础

^①在三阶段编码过程中,如果数据之中不会发现新的类属,则处于理论饱和的状态,就可以着手构建理论;如果依然有新的类属出现,那么就要重复资料分析与三阶段编码,直到理论饱和为止。

上, 本文研究运用“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或互动策略、结果”的模型来链接各个范畴, 并围绕轴心范畴进行概念的重新分类组合排列, 使概念与范畴之间的关系更为明确 (Glaser and Strauss, 1967)。通过分析表 1 中 17 个副范畴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和逻辑关系, 本文建立起 5 个主范畴 (参见表 2)。

表 2 主轴性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内涵关系
乡土社会	地理人文 ^a 村庄秩序 乡贤群体 民间社团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需要依托乡土社会的资源禀赋与社会关系网络, 地理人文环境反映了它与生俱来的文化资源与物质资源基础, 奠定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方向; 同时, 乡贤群体与民间社团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发展提供了内生条件, 而这些也是村庄秩序和谐运行的基础。
政府行为	资源输入 行政干预 科层管理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政府通过资源输入、行政干预、科层管理等方式嵌入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中来,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持续平稳运行。
社会资源	华侨同胞 社会名流 地方企业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发展需要社会资源的协助, 具体包括华侨同胞的捐助、社会名流的捐赠和宣传、地方企业的资助等。
功能转型	社会教育 公共服务 科技革新	随着社会发展,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不断转型升级, 从最初的社会教育, 发展到提供更优质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 并运用最新科技手段, 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
民众参与	文化需求 文化体验 文化认同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参与主体在文化消费过程中产生一种交互关系。在交互过程中民众的文化需求、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的关键要素。

a 地理人文副范畴合并了表 1 中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环境。

(三)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确定核心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并根据核心范畴开发故事线。经过开放性编码和主轴性编码之后, 本文研究确立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五个核心范畴: 乡土社会、政府行为、社会资源、功能转型和民众参与。其中, 因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民众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主体性建构过程, 所以民众参与既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出发点又是落脚点; 乡土社会、政府行为、社会资源、功能转型各要素的最终目标也是为了促进民众参与, 这与政府倡导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宗旨相统一。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影响要素属性来说, 乡土社会与功能转型属于内部动力, 政府行为与社会资源属于外部动力。另外, 乡土社会、政府行为、社会资源、功能转型和民众参与五个核心范畴之间也相互关联, 共同构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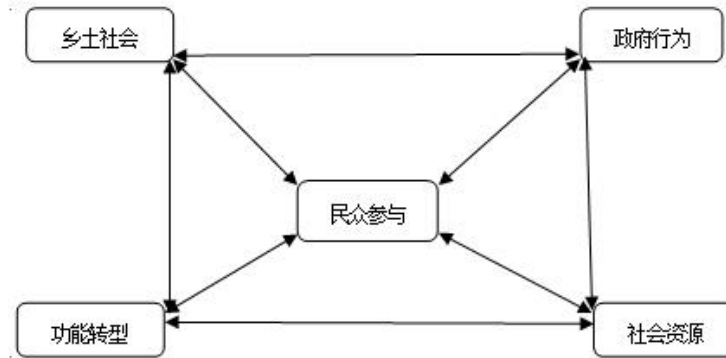


图1 选择性编码过程中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

根据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它们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本文厘清了和顺图书馆发展的故事线。实地调研时，本文研究要求被访者对和顺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阐述，根据对各份历程阐述内容的词频分析和比照相关政策文献，提取出1928年、1980年、2012年三个年份的关键事件作为分阶段节点，并结合对各份历程阐述内容的逐句编码而得出各阶段的影响因素，从而实现了编码、影响因素和发展阶段的契合。回顾和顺图书馆发展历程：1928年，在乡贤群体、旅缅华侨和民间社团的带领下，和顺乡民共同捐资捐书兴建了乡村图书馆，用于弘扬地方文化促进社会教育；1980年，和顺图书馆被政府纳入公共图书馆建制，由国家财政配给图书管理人员和购书经费，成为国家文化事业单位，开始步入正常有序的格式化发展阶段；2012年，和顺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由单纯的图书借阅转变为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同时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顺图书馆迈入共建共享的新发展时期。和顺图书馆90年的发展历程，可根据参与主体和治理模式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1928-1979年属于自发生成阶段，和顺图书馆通过乡贤群体和民间社团的力量，积极争取旅缅华侨和社会各界的捐助支持，艰难维系运行。1980-2011年属于政府主导阶段，政府将和顺图书馆纳入公共图书馆建制，投入公共文化经费进行专门管理，期间扩大了场馆面积和藏书数量，和顺图书馆进入平稳运行状态。然而，科层管理体制导致文化资源只在内部流通，公共权威逐渐消解，农村居民文化认同缺失。2012-2018年属于共建共享阶段，政府职能由建设管理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和顺图书馆的文化事业单位属性开始弱化，成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阵地，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开展网络服务，不断拓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五、研究发现

通过对和顺图书馆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的逻辑机制推理，本文构建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三阶段理论模型（参见图2）。三阶段理论模型能够动态地完整地表现扎根理论的三层次编码。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逻辑次序来看，自发生成—政府主导—共建共享三阶段能较好地解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发展核心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并随着发展阶段的深入推进，主导影响因素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下面本文将结合案例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涉及的核心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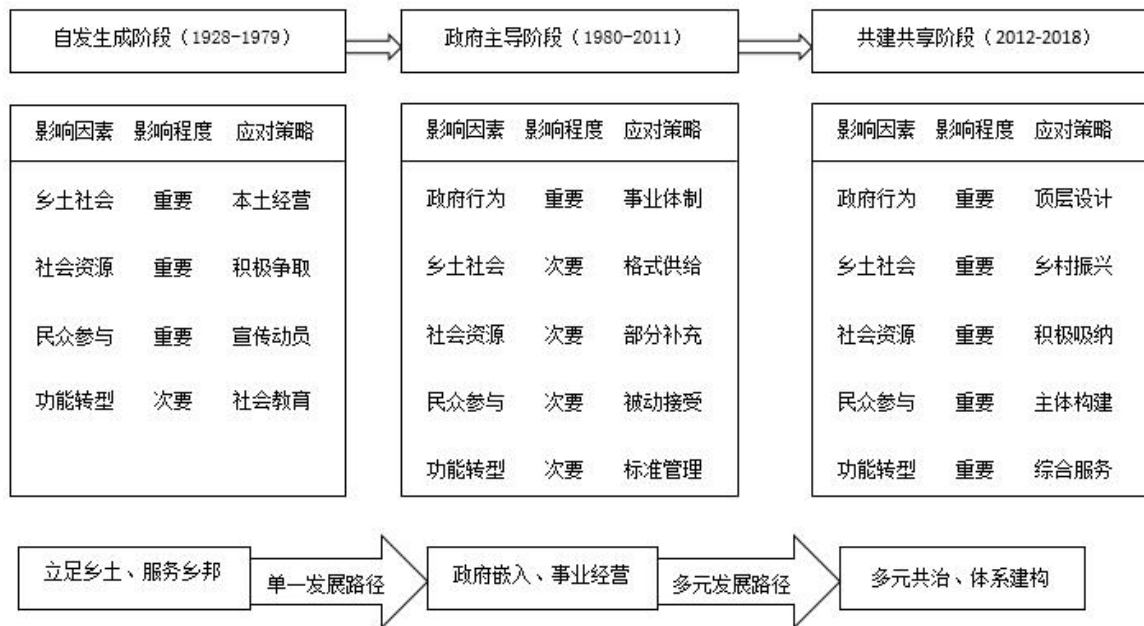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理论模型

（一）自发生成阶段：乡土社会的调适

乡土社会作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赖以生成发展的基础，依靠固有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形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发展（曹海林，2004）。1928-1979年，和顺图书馆的生成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乡土社会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并受地方性知识及生存理性选择支配，具有浓重的民间色彩。在这一时期，和顺图书馆属于乡村内生型公共文化空间。和顺图书馆的案例表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自发生成阶段主要依赖乡土社会的资源网络及其自我调适，尤其是乡贤群体、民间社团和以乡土为纽带的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1. 乡贤群体的示范带领。乡贤是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他们耕读传家，殷实富足，是村庄的道德典范、精神领袖。和顺文化底蕴深厚，“仅在明末到清朝的两百年间，和顺出了8个举人，3个拔贡，403个秀才；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又有12个留学日本；20世纪至今天，仅5000余人的乡里，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就近500人，40多人留学国外”（程亚男，2006）。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教育家寸树声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富有知识见过世面的先进知识分子回到家乡，成为乡村里的意见领袖，他们极力推动家乡文化发展。和顺图书馆的创建离不开乡贤群体的示范带领。从书报社发展到图书馆的最初20余年里，热心经营社务、馆务的有寸仲猷、李文龙、尹以忠、李秋农、寸佩玖、李沛春等先生，他们都是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乡贤。其中“寸仲猷先生最热心、最有毅力，给予的力量最大”；“一切组织计划和规章的厘定，图书的分类编排，以秋农同志苦心研究的功绩为多”；“经理的热心负责，和长期的服务，当推佩玖同志”（杨发恩，2005）。在乡贤群体创建图书馆的热情带动下，乡民们也积极参与图书馆的建设。据《和顺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记载，在图书馆发展的前十年中，慷慨捐赠古籍珍本、报刊、建设经费、书架玻璃等实物者达二千多人次，贡献突出者逾百人。和顺图书馆能得以在中国边疆偏远乡村中创建是乡民在乡贤示范带领下群策群力的一个创举。

2.民间社团的组织经营。民间社团是由不同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王名,2009)。民间社团可以弥补政府因制度僵化而无法适时解决问题的缺陷,民间社团的使命感能够获得社群的信任与认同。萧新煌(2005)指出民间社团等非营利组织具有四种功能:一是参与社会的改革,二是某些社会价值的维系者,三是提供社会服务,四是创造社会参与的通道。在和顺图书馆的创建过程中,咸新社、崇新会等民间社团发挥了巨大作用。咸新社是1905年由留日回乡的张砺、寸辅清等人组织成立的革新社会的社团组织。该社成立后,购买《天演论》《革命军》等新思潮图书提供给乡民阅览,并定期组织演讲宣传新文化,被誉为腾冲“新潮流之第一声也”。崇新会前身为和顺青年促进会,1924年由寸仲猷与李秋农、李湛春等人在家乡组织成立,他们以咸新社的书刊为基础共同发起创办了和顺书报社。1925年,和顺青年促进会与和顺旅缅青年会合并为和顺崇新会。崇新会以联络感情、团结侨胞、建设家乡为宗旨,每年出版一期《和顺崇新会会刊》和一期《和顺乡》杂志,对家乡的政治、经济、文化提出改革建议,并积极筹款兴办家乡建设事业。1928年崇新会改组和顺书报社为和顺图书馆,并将馆址迁入咸新社原址(黄体杨、杨勇,2014)。当时,和顺图书馆订阅有上海的《文汇报》《大公报》和《申报》,缅甸的《仰光日报》《觉民日报》,还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了《万有文库》和《小学生文库》。这些书报需要先走水路运到缅甸仰光,再从密支那由马帮走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运到腾冲,正如和顺图书馆至今仍收藏的当时一副木刻对联上所写的那样:“书自云边通契阔,报来海外起群黎”。崇新会会员除按时交纳会费外,还积极捐书、捐物,并认定年捐,给和顺图书馆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从成立书报社那个时候起,到改组成立图书馆,建盖新馆屋,崇新会多次到缅甸各地募捐,对家乡公共文化建设和无私奉献。在崇新会的组织策划动员下,乡民们和旅缅侨胞踊跃捐赠,基本维系着和顺图书馆的正常运行。

3.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顺图书馆的创建依靠乡贤群体的示范带动、民间社团的组织经营,同时也得到了当地广大民众和各地华侨同胞的认可与支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为和顺图书馆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和顺图书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捐赠图书报刊以充实馆藏。和顺图书馆的图书报刊“大部分是募捐得来”(仲猷,1939)。例如民国元老李根源从1940-1960年先后数次向和顺图书馆捐赠个人藏书达两千余册,其中多为珍贵古籍善本书,为和顺图书馆的馆藏建设贡献了力量。二是捐赠运行经费及设备。1937-1938年和顺图书馆筹建新馆舍时,除了崇新会通过募捐、发行奖券以及收缴会费等途径共筹集资金1.7万余元外,还获得了包括乡公所、平民学校、农林处与广大民众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捐款共计5663.41元。图书馆所用的书架、书柜是由地方企业购买捐赠而来。另外,当时的社会名流也积极声援支持和顺图书馆的发展。例如胡适、艾思奇、李生庄、张天放、寸树声、龚自知、廖承志、熊庆来、汪曾祺等人在不同场合通过媒介宣传和顺图书馆的事迹,为和顺图书馆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之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大力支持。

1928-1979年是和顺图书馆自发生成阶段。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特点是乡土社会内部通过乡贤群体的动员和组织民间力量助推发展,形成了“共有、共办、共享、共治”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民间自办的形式导致和顺图书馆并没有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支持,资金匮乏是其发展的最大瓶颈。尽管和顺图书馆经费筹措困难重重,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但是依赖当地民众和华侨的努力,以及组织者近乎奉献

的管理，其可支配经费仍时有补充，从而造就了“中国乡村图书馆第一”的辉煌。这一阶段和顺图书馆的文化参与主体较为多元，主要有乡贤群体、民间社团和以乡土为纽带的侨胞、社会名流及企业。各文化参与主体自觉自发，构成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自发生成的源动力。应该看到，在和顺图书馆自发生成阶段，由于时代动荡、政治局势混乱、社会经济凋敝，政府的力量相当薄弱，还无力顾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领域。政府力量的缺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自由成长，同时迫使乡土社会最大限度地进行自我调适，调动一切资源、联合一切可以参与的力量进行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遂成为全体参与者的文化共同体，并通过各主体的文化参与培育了乡村公共文化精神，构建了乡土社会的公共秩序。但是，政府力量的缺席也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相当脆弱，极易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因此，政府力量如何介入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长效、有序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政府主导阶段：政府行为的嵌入

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它推动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现代化。1980年政府将和顺图书馆纳入公共图书馆建制，从此，和顺图书馆由民间私立图书馆转变为国家公立图书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全面嵌入到和顺图书馆的管理和运营等事务中来。这一时期，和顺图书馆经历了从乡村内生型公共文化空间到行政嵌入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变。政府行为的嵌入主要表现在建立事业单位的管理机制和实施行政供给的分配机制。

1. 建立事业单位的管理机制。为加强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支配能力，政府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建立了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文化机构和人员成为国家文化统制纲目中的单元网格。公共图书馆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人事编制、人事任免、薪酬分配等方面都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图书馆本身没有自主权。和顺图书馆1980年被纳入国家公共图书馆后，其管理运行经费被纳入政府财政预算。这一时期，和顺图书馆有编制工作人员5人，年购书经费2万元，基本上能够保障正常运行。2005年后，国家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还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予以项目补贴支持。例如2009年，政府投资350万元在和顺图书馆东侧的景山园内建成一幢一正两厢仿古木结构的建筑，用于存放中宣部捐赠的9211册中华再造善本古籍并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提供场所。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有力促进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的基本需求。这种文化惠民工程，体现了国家行政主导的社会公平原则。但是这种以公平为导向的事业单位管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在行政管理一刀切的简单化、绝对化模式下，事业单位管理制度将社会力量和乡村资源排斥在外。管办不分、政事一体的内部管理考核机制缺乏清晰透明的财务账目，也没有建立切合地方实际的目标管理体系与基于当地居民满意度评价的绩效考核制度，这些都导致事业单位管理机制的运行效率低下。

“以前（私立时期）村里人人都可以是图书馆的管理人员，自愿捐书捐款，一起参与到图书收藏整理中来，不拿一分钱，但感到幸福，是一份光荣。现在（公立时期）馆员都是政府编制，每年也有政府经费，开馆闭馆有一套自己的规定。我们已经不能随便进去管理和阅读了。馆员专注自己的事，他们在干什么我们也不清楚，缺乏服务热情。感觉图书馆好像变了味，从庭院变成了衙门。以前的亲切

感变成了一种疏离感。”（村民访谈，2016年7月10日，男，76岁）

2. 实行政供给的分配机制。为了保障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的集中统一，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文化生产配给模式。在国家行政供给的模式下，公共图书馆事业由国家包办，公共图书馆成为政府的延伸，其独立性和自主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缺失。虽然这种模式基本保障了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来源，但是格式化的行政供给具有很强“议程强制”“形式强制”与“渠道强制”的色彩，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表达机制，对于个体化差异性的文化需求很难兼顾，农村居民无法根据自己的文化偏好进行选择。

“图书馆的图书主要是由新闻广电出版社统一配送，图书馆没有选择权。现在书倒是很多了，已不再接收村民个人的捐赠。图书馆也不了解村民的文化需求，不知道现在人的口味，毕竟众口难调。也没有专门的经费去开展其它的一些公益文化活动。”（馆员访谈，2016年7月11日，男，52岁）

这种政府行政主导的文化供给是广覆盖和福利化的，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民间供给和市场供给形成了挤出效应，影响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多元优化选择。高度行政化加深了公共图书馆对政府的依赖和依附关系，公共图书馆没有自主权，一切依照政府计划指令行事，缺乏活力。这些都导致和顺图书馆与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错位脱节，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大降低。

总之，通过政府行为的嵌入，和顺图书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立足于“计划配置、干部任命、专业技术”这三大基础之上，形成了“资源体制内循环、身份刚性约束、行业壁垒”三大特征（傅才武，2013）。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和顺图书馆的人员配置和经费来源，有利于建立结构完整、功能强大的公共文化动员体系，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投入的效率低下，社会整体文化福利水平不高。事业单位的管理机制和行政供给的分配机制导致和顺图书馆这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一种“内向封闭型体制”，显得秩序有余而活力不足。“由于存在权力身份与服务身份混存、公共利益与机构利益混杂、履约职责与就业职责混置的制度特征，业已形成一种凝固和僵滞的官僚制结构”（傅才武，2012）。这种封闭型空间和官僚制结构与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个性化差异性文化需求脱节，也容易造成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等一系列政府失灵的问题（肖容梅，2010）。

1980-2011年是和顺图书馆从乡村内生型公共文化空间转变到行政嵌入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过程。这一阶段和顺图书馆的文化参与主体较为单一，演变为政府力量主导的“唱独角戏”局面。政府行政力量强有力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和顺图书馆的基本管理运营，提供了较为稳定统一的资金来源，也提供了固定格式化的文化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和顺图书馆的基本运行和农村居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但同时，文化资源的体制性垄断导致了对民间力量的排斥。民间文化力量成长不足，政府长期唱独角戏的结果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分裂，大众文化的“去意义化”倾向日益明显，精英文化越来越失去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力，从而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悬浮”于乡土社会，乡村文化治理反而陷入内生权威缺乏和外生权威弱化的双重困境。因此，如何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激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生活力，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能够扎根乡土，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共建共享阶段：多元力量的整合

为适应变化的环境、面对动态的社会，文化改革发展必须重新调整文化组织的形态和运作模式，关注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立有机式的、动态式的文化管理体制。中共十八大以来，文化

改革发展注重顶层设计，由外延改革向核心改革推进，由单项治理走向综合治理，不断优化体系建设，增强文化治理能力。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参与，坚持共建共享，优化配置各方资源，提升综合效益。共建共享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模式。和顺图书馆2012年实行公共文化服务免费开放，实现了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场地和设施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另外，图书馆在相关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方面也开始逐步实现多元主体的社会化服务。和顺图书馆已经开始迈进共建共享阶段。

1.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社会治理的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使得社会管理体制的主体、理念、组织形式发生改变，最明显的特征是社会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体转变成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多元治理主体（邵光学、刘娟，2014）。在公共文化治理领域，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办文化管文化，而是向提供文化服务转型。这一转型并不是代表政府的文化职能弱化了，而是对政府文化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它要求政府盘活多元主体的力量，并维护好社会文化秩序。2017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这部法律主要从设施建设、法定条件、经费人员等三个方面明确了政府保障公共图书馆运行的法律责任。按照现代治理理念，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服务目标均等化、服务手段标准化、供给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民主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管理体系法治化的基本特征（刘娟萍，2018）。

2.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化运作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参与已体现出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薄弱与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提出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举措。2013年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要求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2015年颁布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也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2015年出台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进一步细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与内容。随着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运作的推进态势日渐明显，各级文化部门逐步统筹考虑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方面的政策，着实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推动本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和社会化参与，引导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向竞争性、优质化和高效能方向发展。

“过去，图书馆主要功能就是借书和阅览，几乎不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现在，我们觉得参加和推进公共文化活动，也是我们公共图书馆的使命。近年来，我们主动与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昆明少儿图书馆等合作，共同举办‘碧血千秋’‘天地正气、血肉丰碑’等专题讲座及图片展，社会反响非常好。”（馆员访谈，2017年1月7日，男，45岁）

“和顺图书馆为丰富少年儿童的假期生活，培养孩子的文化知识趣味，这两年免费开办了书法、国学、英语等公益培训班，专门邀请教学经验丰富的专业老师授课，每期培训班有40-50名少年儿童。”（馆员访谈，2018年7月12日，女，36岁）

2015年和顺图书馆被纳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范畴，政府购买的内容主要有三种：一是场地、设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交由社会主体负责运营和管理；二是公共文化活动的承办根据图书馆自身需要提出服务要求，由文化企业、文化团体等社会主体提供服务，政府给予补贴或资助，如图书馆开展的文化讲座、暑期夏令营读书会、诗词比赛等一系列活动；三是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聘用编制外工作人员，有效填补专业服务人员缺口。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效能、扭转了公共文化资源空间配置结构性失衡的局面。

3. 确立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尊重公民文化权利的伦理取向，又是促进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变革的现实路径。文化惠民工程建设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不断拓展服务范围，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陈瑶，2012）。和顺图书馆坚持需求导向，积极开展读者服务活动，整合社会资源提供专业服务，并指导村（社区）分馆、图书流通站的建设与服务。为促进图书资源便捷快速使用，和顺图书馆建立了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库，用于开展互联网知识普及培训和实现网络文化资源共享。针对外地游客，和顺图书馆专门设置了乡村文化展示栏，向游客展示和顺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促进公众参与。和顺图书馆还专门建立了一套公众参与机制，该机制以公共文化服务对象（包括社区群众和外地游客）为中心，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包括相关政府部门及企业、民间组织等）为主导，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监管部门对机制运行进行监管和矫正。

2012-2018年是和顺图书馆实施共建共享的阶段。这一阶段和顺图书馆的文化参与主体在政府的调动、吸纳、整合下不断汇入、充实、壮大，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力量参与格局基本形成。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民间力量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融合聚力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进程中来。其中，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提供文化服务，为社会力量提供文化参与的平台和空间，同时对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考核，不断优化文化参与体系，提升现代文化治理能力；企业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成为提供个性化差异性文化供给的有效媒介；民间社团的能量也得到了很好的激发，成为乡村社会文化自给的蓄水池。在政府合理有效的调度下，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和共享的运行模式初步成型，政府引导建构—市场参与建构—民众中心建构的多维复合结构不断优化，包容开放多元一体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新生。和顺图书馆重新焕发为地方文化标识和社会精神共同体，源源不断汲取乡土社会文化资源和吸收新时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不断培育着社会公众。

六、总结

“双虹桥伴名书府，拜谒登临，凭栏抒逸，兴枕中天，俯粮川，挽二阁，眺龙光，山环水抱，堪称边塞桃源。追忆七十年沧桑，仰赖先哲贤达，赤子侨胞，富贾巨商，能工巧匠，呕心沥血齐奉献，把握人类生态，保平衡，循序渐进，育栋梁，赢来华夏东西南北中，乡村首创图书馆。文笔塔映经典库，移目览观，开窗择宝，鉴演周易，悟春秋，察百科，译语系，日积月累，逐成知识海洋。拥列八万卷著述，尽供童稚青少，樵父耕夫，良师益友，游客嘉宾，聚精会神细磋商，造就时代群英，皆自强，次第鹏飞，凌云霄，遍及全球亚欧澳非美，锦衣更上藏珍楼”。这是1998年和顺图书馆成立70周年庆

典上，由旅缅瓦城云南同乡会敬献的一幅长联，收录在杨大禹和李正于2006年编写的《人居和顺》书中。上联描述了和顺图书馆的地理环境与创建历程，下联盛赞了和顺图书馆的规模与社会效益，从中可了解到和顺图书馆起到的历史作用与社会价值。在2018年10月17日和顺图书馆建馆90周年庆典上，地方政府、民间组织、企业、海外侨胞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聚集和顺，祝贺这座“乡村瑰宝”历久弥新。和顺图书馆现已成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知识乐园，也成为吸引外地游客的文化标识。

通过对和顺图书馆经验事实的发现和解释，本文论证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本文认为和顺图书馆经历了从乡村内生型公共文化空间到行政嵌入型公共文化空间到共建共享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变：在自生成阶段，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依赖于乡土社会的内部资源网络及其调适能力，主要是以立足乡土服务乡邦为宗旨；在政府主导阶段，政府逐步加强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管控，并按照事业单位体制进行管理。这期间由于政府借助一体化行政命令体系，建立起了科层式公共文化生产分配机制，资源向上集中。这虽然从体制上保障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有较稳定的经费来源，但同时也导致其“悬浮”于乡土社会，与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脱节；在共建共享阶段，政府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不断优化体系建设，增强文化治理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鼓励社会参与，重视各方力量的汇入与整合，建立各方联动的协同机制，提升了综合效益。

透过和顺图书馆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发展不仅依赖乡土社会自身的秩序生产能力，还依靠国家的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要基于乡土社会、政府行为、社会资源、功能转型、民众参与等要素，只有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与外部嵌入的建构性秩序有机耦合才能促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健康长效发展。和顺图书馆的案例也为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提供了如下启示。（1）乡土社会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坚实基础。只有扎根乡土，满足乡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并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才能融入乡民的日常生活，历久弥新，成为文化育民乐民富民的平台。（2）政府引导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有力保障。由于乡村物质资源相对匮乏，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政府可以调动各方面的优势资源来推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只是政府在嵌入的过程中需要以乡民的诉求和利益为中心，并正确处理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关系，整合各种力量共同汇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中来。

（3）社会力量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重要推手。事业单位、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个体都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社会化主体，政府要促进公共文化设施的委托经营与管理、公共文化项目的社会化生产、公益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并健全现代文化赞助、文化捐赠模式，创造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4）功能转型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着力方向。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要实现功能转型，从传统的、单个的、分散的、隔离的单向式空间转变为现代的、综合的、集聚的、交融的互动式空间，以满足不同群体差异性个性化的文化需求。（5）民众参与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根本动力。政府要重视培育乡村文化的内生机制，让农村土生土长的文化发展壮大起来，实现由政府“送文化”向“种文化”的根本转变，逐步将重点转向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鼓励群众自发参与到活动中来，让群众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角。

和顺图书馆的生成演进过程，对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一方面，和顺图书馆较为完整地经历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自发生成、政府主导、共建共享三个阶段，能够较好投射出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演进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机制。因此，本文所归纳构建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三阶段理论框架是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大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或其中之一二，本文研究大致可为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机制提供较为完整清晰的图景。另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本质上是各个认识主体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主体性建构过程。政府、社会力量、农村居民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发挥着空间塑造、空间生产、空间重塑的重要作用。文化参与的主体是单一还是多元、参与的途径是自上而下还是上下联动、参与的内容是简单还是丰富多样、参与的程度是分化粗放还是集约精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实际成效。基于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必须要关注和重视各文化参与主体的状态和效果。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动态的系统，涵盖了农村居民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息息相关。本文所分析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理论模型可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至于如何构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治理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健康长效的运行机制，则要根据具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场域和不同的文化参与情境进一步作实证研究。本文虽有所提及，所建构的三阶段理论模型也提供了相关启示，但限于主题和篇幅没有完全展开和系统讨论，笔者将另行撰文专门探讨。

本文尝试建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的逻辑框架，但其学术潜力的充分发挥还需要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支撑。同时，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尚需后续研究进行弥补：一是本文为个案描述，无法通过复制逻辑进行跨案例分析，研究结论是否可以推广至全国其它地区还有待考证。二是本文案例资料来源虽然包含了一手资料（历史档案和政策文献）和二手资料（调查访谈资料、出版论著），但都为定性资料，资料记述的主观评判对研究结论构成一定影响。因此，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在这两方面改进完善：一是比较分析与系统分析相结合，通过比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路径，结合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任务、目标和基本要求，系统分析其运作机制等方面的经验；二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数据采集获取定性和定量数据资料，采用相关模型和层次分析法，深入分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现状，并结合实际，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供解决路径。

参考文献

- 1.布赖恩·多利、尼尔·马歇尔，2009：《澳大利亚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孙广厦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 2.曹海林，2004：《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人文杂志》第6期。
- 3.陈波、丁程，2018：《中国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分析与评价：基于场景理论的方法》，《江汉论坛》第7期。
- 4.陈波、耿达，2014：《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空心化、格式化与动力机制》，《中国软科学》第7期。
- 5.陈波、侯雪言，2017：《公共文化空间与文化参与：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实证研究》，《湖南社会科学》第2期。
- 6.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7.陈瑶, 2012:《公共文化服务: 制度与模式》,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8.程亚男, 2006:《边边上的文化绿洲》,《深图通讯》第1期。
- 9.傅才武, 2012:《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转型》,《江汉论坛》第1期。
- 10.傅才武, 2013:《中国文化管制体制: 性质变迁与政策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期。
- 11.傅才武、侯雪言, 2016:《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艺术百家》第6期。
- 12.耿达、傅才武, 2015:《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 内涵与模式》,《天津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 13.何兰萍, 2007:《关于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思考》,《学习与实践》第11期。
- 14.黄体杨、杨勇, 2014:《民国时期的和顺图书馆: 发展历程、经验与启示》,《山东图书馆学刊》第3期。
- 15.贾哲敏, 2015:《扎根理论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方法与实践》,《中国行政管理》第3期。
- 16.李志农、乔文红, 2011:《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学术探索》第4期。
- 17.刘娟萍, 2018:《从公共图书馆法看我国政府管理公共图书馆思想的演变》,《图书馆》第10期。
- 18.马永强, 2011:《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与实现途径》,《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
- 19.任珺, 2014:《跨越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邵光学、刘娟, 2014:《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浅谈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学术论坛》第2期。
- 21.唐亚林、刘伟, 2018:《党建引领: 新时代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治逻辑、实现机制与新型空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6期。
- 22.王名, 2009:《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23.王永章、胡惠林, 2016:《中国文化发展指数报告》,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4.吴军, 2015:《市民参与的文化转向——城市公共政策国际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
- 25.吴理财, 2015:《以文化治理理念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26.吴理财、邓佳斌, 2014:《公共文化参与的偏好与思考——对城乡四类社区的考察》,《中华文化论坛》第8期。
- 27.肖容梅, 2010:《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第3期。
- 28.萧新煌, 2005:《非营利部门: 组织与运作》, 台北: 巨流图书有限公司。
- 29.杨大禹、李正, 2006:《人居和顺》,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 30.杨发恩, 2005:《和顺乡土卷》,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 31.章丽华, 2014:《以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促进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中国集体经济》第16期。
- 32.张小莉, 2015:《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 式微与重构》,《求实》第1期。
- 33.仲猷, 1939:《本馆经济史略》, 载云南腾冲和顺乡和顺图书馆编辑委员会编《和顺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 仰光: 明明印务有限公司, 第12-18页。
34. Bezboruah, T., and C.Karabi, 2013, "Community Organizing for Health Care: An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 21(1-2): 9-27.
35. Clark, T.N., 2013, The Theory of Sce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6. Gersick, C.J., 1988, "Time and Transition in Work Teams: Toward a New Model in Group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1 (1): 9-41.
37. Glaser, B., and A. Strauss,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Press.
38. UNESCO/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The 2009 UNESCO Framework for Cultural Statistics*, 2009.
39. UNESCO/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Measuring Cultural Participation*, 2012.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师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责任编辑: 小 秦)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Heshun Library in Yunnan Province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Geng D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is importan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its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path.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shun Library (1928-2018),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path.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self-generation stag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depended on the internal resources network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its adjustment ability, mainly aiming to serving the local people. In the government-led stage, the government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and established a hierarchical public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resources were concentrated upwards. Although the system guaranteed a relatively stable source of funds, it also led the library to become "suspended" in the local society and out of touch with the cultural life of local residents. In a later stage of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guided by the cultural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the government continuously optimized system construction, encouraged social participation, stressed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forces, and established synergistic mechanisms for all parties to enhance their comprehensive benefit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lements of rural society, government behavior, social resource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conclusio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shaping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China.

Key Words: Public Cultural Space; Generation Mechanism; Local Society; Government Behavior;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